



当代比较文学 与方法论建构

上册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杨乃乔 刘耘华 宋炳辉 主编



当代比较文学 与方法论建构

上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杨乃乔、刘耘华、宋炳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9-09808-2

I. 当… II. ①杨…②刘…③宋… III. 比较文学-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3049 号

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

杨乃乔 刘耘华 宋炳辉 主编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1 字数 1410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08-2/I·769
定价: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1年8月9日至11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and Methodological Rethinking)。“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大学协办,清华大学对本届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也给予了鼎力支持。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在上海的召开,无论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推动,还是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影响,其均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981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同时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此后,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每三年在国内不同地区的高校举办一次,三十年来,这样一个重大的学术活动曾在国内与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是在“三十年”与“第十届”两个完整的历史性数字所指向的时间界标上召开的,并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其毫无疑问是一次重大的、承前启后的国际性学术盛会。

“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是迄今为止以“中国比较文学年会”的学术名义所举办的规模最为盛大且成功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根据此次会议组委会所掌握的相关信息统计,有400多位中外学者以正式注册的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而在开幕式当天及后来的两天会议活动中,实际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多达500位以上。这500多位与会学者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加拿大、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及台港澳地区的1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因此国际性、多元性、前沿性与对话性构成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品质。

此次会议的学术品质不仅呈现在会议的组织观念、方式、规模及其与会者所持有的整体学术心态上,也更呈现在围绕着会议主题——“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所设定的16个工作议题和圆桌会议议题上。可以说,在最为准确及宽阔的学术走向上,这16个议题的设置凸显了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所接轨与呼应的恰切逻辑关系。在此,我们特别辑录这16个议题,以学术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学界:这曾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及国际比较文学界所共同经历过的一次学术行动:

1. 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
2. 中外比较诗学;
3. 中外文学关系;

4.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5. 世界文学经典的跨文化诠释；
6. 流散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
7.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中国学；
8. 文学与宗教；
9. 文学人类学；
10. 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及教学研究；
11. 东亚文学关系研究；
12. 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13. 新媒体与文学书写；
14. 城市：观念、历史与文学再现；
15. 文学期刊的作用与现状；
16. 青年学者论坛。

“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在上海的举办，无疑是对上海比较文学界整体实力的一次检阅及在整体学科发展上的推动。比较文学研究在上海曾有着悠久的学术历史，并且上海多所高校在比较文学学科点的建设上已形成了硕士、博士与博士后培养的完整建制，此次年会是在上海多所高校及其同仁通力合作下召开的一次比较文学盛会；此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在会议场馆的使用上调用了上海高校最具有先进性与整体性的国际学术会议场馆，并以组织的严谨性、配合性与有序性为此次会议的学术含量及与会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毫无疑问，在学术的凝聚力上，此次会议的召开也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各高校比较文学学科点及其同仁之间的合作性与对话性。

遵照历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的惯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对此次会议的与会学者所提交的 400 多篇论文进行了遴选，从中提取出 110 篇学术质量优秀的论文，以编辑出版一部 148 万字的会议论文集——《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以纪念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部论文集也更是以文本的形式来记忆这次不可复制的盛会，也更是为中国及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当下者与后来者提供一部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及可具有文献参考性的文本。

最后，还是让我们记住印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封面上的那句具有凝聚力且激动人心的表达：**全世界学者联合起来，文学让世界更美好(Scholars of All Lands Unite, Better Literature Better World)!**

主编

2014 年 3 月 11 日

上海

目 录

前言 / 001

学 科 总 论

- 乐黛云 关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 / 003
弗朗索瓦·于连 对比较的重新思考 / 009
张汉良 “文学性”与比较诗学——一项知识的考掘 / 019
陈思和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
——试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 034
王 宁 面对文化研究的挑战：比较文学的未来 / 042
曹顺庆 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 051
查明建 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 057
高旭东 世界文学的跨文化反思与学科重估 / 063
王宏图 在西方的目光下——当代文学价值评判与世界文学标准 / 069
范 劲 作为交往媒介的世界文学及其未来维度 / 074

回归文学性与比较诗学

- 马立安·高利克 Interliterariness and the Interliterary Communities / 087
张哲俊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 / 099
周荣胜 比较诗学的方向：回到钱锺书 / 108
陈跃红 穿越文化疆界与回到历史现场——再读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读本》 / 113
张 沛 “文学”的解放 / 118
代 迅 选择的西化：两种审美态度及其现代命运 / 123
丁尔苏 互动与启迪：跨文化研究的求知动因 / 134
方汉文 《海天诗话》与中国比较诗学的滥觞 / 142
耿幼壮 火焰与灰烬之思——德里达的“符号学” / 150
郭西安 隐喻与转喻：诠释学视域下西汉“《春秋》学”的两种话语模式
——以《春秋》之“楚庄王伐陈”为例的分析 / 159
姜 哲 从汉代经学诠释学看“《诗》无达诂”的生存论意义 / 168
张万民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诗学：从刘若愚到余宝琳 / 176
汪建峰 韦恩·布斯与当代西方伦理批评 / 184
汪洪章 《庄子》、《文心雕龙》与现象学方法 / 194

- 杨乃乔 “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与华夏民族的“离散精神原型”
——兼论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 / 204
- 张 辉 亚里士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 219
- 李庆本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跨文化阐释 / 227
- 陆晓光 庖丁解牛与《资本论》创作——关于劳动与工作的“艺术性质” / 234
- 张 锦 福柯的“异托邦”思想与比较文学方法论新探 / 243
- 张 莉 以时间的方式思考存在——卡夫卡的时间叙事体系研究 / 254
- 陈 庆 历史书写中的知识暴力——论斯皮瓦克的历史观及其对历史档案的解读 / 263

国际文学关系与影响研究

- 陈建华 论新世纪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 / 275
- 周云龙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元地理想象：实践与反思 / 283
- 葛桂录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 / 290
- 邓经武 布莱希特对“四川”的接受与互动 / 300
- 冀爱莲 胡适眼里的海外汉学——以胡适与阿瑟·韦利的交游为例 / 305
- 李伟昉 梁实秋莎评特色论 / 319
- 李伟民 “何必非真”的审美原则与黄梅戏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 / 329
- 刘洪涛 徐志摩剑桥诗歌的中英文化背景分析 / 337
- 周 阅 从日本儒学看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 345
- 叶向阳 为揭露英国社会的弊端还是为中国进行辩护？
——评迪金逊的《约翰中国佬信札》，兼论“东方信札”体裁特色 / 352
- 张 静 雪莱文学形象的建构——以民国时期(1908—1937)的英国文学史为例 / 361
- 泊 功 夏目漱石《满韩处处》的“歧视”性描述与写生文 / 370
- 王小平 “东亚鲁迅”不同面向初探——从《故乡》的比较研究谈起 / 376
- 金柄珉 朝鲜北学派文学与清代诗人王士禛 / 384
- 徐东日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中国形象嬗变的内因 / 394
- 周以量 永井荷风及其汉学修养初探 / 400
- 宋炳辉 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世界性因素” / 411
- 蔡春华 从“理想”到“觉醒”——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的构造及其悖论 / 418
- 张西平 对所谓“汉学主义”的思考 / 426
- 王柏华 “汉学主义”：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 436
- 季 进 跨语际与跨文化的海外汉学研究——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对象 / 442
- 邓建华 辞格、文化相对主义诗学与比较的基础
——一场比较文学学者与汉学家之间的论争 / 450
- 段 炼 北美高校的中国文学课程 / 458
- 郁龙余 《道德经》印译的意义 / 468
- 孙宜学 泰戈尔与周作人 / 474
- 张 晶 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当代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中国历史想象 / 482

“文化记忆”与流散写作

- 白 杨 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 491
- 曹惠民 “新移民文学”说的辨析与质疑 / 498
- 高 鸿 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华裔社会的生育风波
——《吃一碗茶》的种族政治和文化隐喻 / 504
- 李 娜 “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 / 511
- 邱苑妮 由岛至岛——论黄锦树的返乡书写 / 523
- 杨君宁 薪传渡海：齐邦媛《巨流河》中的历史书写与文化想象 / 532
- 赵小琪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国形象的类比想象方式论 / 540
- 庄伟杰 流散写作、华人散居和华文文学 / 548
- 李詮林 海外华人文学回返中国传播现象初论 / 555
- 张 颖 寻找历史的碎片——近 20 年海外学者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电影的思考 / 563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翻译

- 谢天振 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去”？——译介学视角 / 575
- 李爽学 明末翻译与清末文学新知的建构 / 581
- 蒋 童 术语链：韦努蒂翻译研究的生成 / 602
- 高 玉 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翻译 / 610
- 郝 岚 哈葛德首部中译小说在晚清的最初冷遇
——从 *She* 到《长生术》与《三千年艳尸记》 / 617
- 胡秋冉 从翻译到创作：余光中对狄金森诗歌的接受 / 625
- 任东升 裴继涛 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 / 636
- 姚君伟 译者如何存在？——论译者文化身份的建构方式 / 646
- 张上冠 随遇：论作者与译者的翻译伦理关系 / 653

经典的跨文化诠释

- 戴从容 “什么是我的民族”——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爱尔兰身份 / 665
- 杨莉馨 “我们拥有同一双眼睛”：论贝尔绘画艺术与伍尔夫美学探索的关联 / 675
- 姜小卫 记忆的承诺：“午夜之子”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 684
- 汪介之 关于《日瓦戈医生》的一种“跨文化诠释”——论艾娃·汤普逊对作品的误读 / 694
- 张铁夫 “第一浪潮”俄国侨民学者、作家的普希金研究 / 703
- 陈戎女 从斯巴达到波斯的“异邦”形象 / 711
- 程志敏 作为神法的 *themis* / 720
- 金桔芳 一种怀疑的文学——克罗德·西蒙与余华的小说观比较 / 727
- 吕 健 “教谕”之下的诸神与凡人 / 736

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 杨慧林 读经之“辩” / 757
- 周 宪 跨文化研究向其他学科学什么? / 760
- 陈义海 变了形的福音——唐代景教文献研究 / 770
- 何云波 上帝如何叙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神学” / 782
- 梁 工 对耶稣的深层认知：耶稣心理传记概论 / 789
- 倪 萍 《李尔王》：异教语境中的神学追问 / 796
- 张 煜 沈曾植与佛教 / 804
- 张志庆 潘源源 从反叛到屈从——北村基督教小说创作论 / 812
- 赵怀俊 斐洛神性思想及其文艺神性论体系 / 818
- 代云红 文艺学的人类学转向 / 826
- 徐新建 英国不是“不列颠”——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比较研究 / 834
- 陈晓兰 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 / 846
- 陈 静 “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西方当代电子文学一瞥 / 855
- 陈世丹 论新媒体与文学书写 / 863
- 严纪华 书写台北：台北城的文学景观 / 875
- 肖庆华 都市书写——多丽丝·莱辛与王安忆作品比较 / 885
- 梁淑雯 公共领域与文艺报刊：晚清“乌托邦话语”形成之考察 / 894
- 王 云 艺术正义是如何借助于宗教正义的
——以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为主要样本的研究 / 905
- 谢文娟 “武松打虎”：关于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中口头性和书面性的比较研究 / 915
- 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与跨文明研究：问题与对策 / 925

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与教学

- 陈 惇 季羨林比较文学思想初探 / 937
- 王福和 比较文学教学的跨学科思考 / 949
- 萧盈盈 扰乱和观点——关于于连的研讨会和访谈 / 954
- 马立安·高利克 纪念我们共同的朋友——杜威·佛克马 / 958
- 刘耘华 追忆先师孙景尧先生 / 962

学科总论

关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

乐黛云(北京大学)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历史已不再是以线性历史为先设的、有序排列的、有固定结构和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体现无限差异的、多元的开放性文本,像是随时变换的、“由点线连接编织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福柯)。这种变化显然为抵制文化的单极化、同质化,同时为建构一个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理想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一、新的变化和新的思考

面对这样的重大变化,很多卓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反思历史、考察现实,感到了西方文化自身的危机。

他们感到全球化的“帝国”统一趋势引起了民族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因素,就得借助残酷战争和无情统治,残酷战争和无情统治又会结下新的仇恨。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冲突。西方已有的思想武器显然已无法解除当前已经形成的仇恨的死结!而全球化的最大误区就是不顾一切的“发展”观念,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衡量一切,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被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也就忽视了存在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甚至生命的质量。他们认为,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所培育出的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①很多人认为人类需要一次新的精神飞跃,即人的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人类需要的,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霸权帝国,而是一个多极均衡的、文明开化的、多元发展的联盟。这就引起了西方的文化反思和重新认识世界的热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提出的各种应对理论层出不穷。以下想举几个例子。

1. 复杂性思维

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

^①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封底页。

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他倡导的复杂性思维既有综合性,又有具体性;既有网络性,又有纵深性;既有历史性,又有前瞻性。他反对笛卡儿式的“分离”(分类)和“化简”(通约),不仅提倡错综复杂地交错和交织,而且尝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传统时间概念的单向单线结构,转变成多向多维度的可能。他提出必须充分考虑到“宏观的物质能量”、“生命体的物质能量”及“生命体的心理能量”三者之间的“三极交错,循环生成”,鼓励人们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清算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危害的同时,自觉地运用复杂性思维的方法,使自己首先成为自身生命及周围生活环境的主人,并对世界和生命的未来给予实际的和有效的关切,在自身实践可及的范围内,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及智慧,监督和影响自己和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2. 互为主观的认知方式

以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认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应是重返自身的文化源头,重新审视历史,找到新的出发点。这就需要一个新的“他者”,以便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中特别强调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②。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

3.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在回顾20世纪末,后现代社会零散化、浮面化、疏离化的弊病之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21世纪初提出了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的新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认为“没有恒久不变的实体,只有持续变化的关系”;不应把人视为一切的中心,而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约翰·科布(John Cobb)认为这种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与中国传统的许多思想都是“深度”相通的。例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他举例说,现代西方思想从分离和分类开始,现代医学区分了病原体和健康细胞。将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分开,消灭不纯粹的。中国的阴阳却开始于对立面的统一,所以中医寻求的是平衡,而不是分离和纯粹。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摧毁行动者,中医讲的却是个体与整体的协调,使体内的力量达到平衡。他认为《周易》强调“变易”和“生生之道”与怀特海强调“过程”两者正相契合,他坚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

4. 给文学和人文主义重新定义

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阿尔曼多·尼希教授(Armando Gnisci)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

① 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② 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前言,第3页。

比较文学》一文中指出,“必须从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确切说,一个我们都与之有牵连的‘后殖民世界’的角度出发给文学和人文主义重新定义。这个方向也许会导致一种全球的、多层次的新人文主义公式。这个公式不再是欧洲文明借口其所谓的理性的普遍性而强加于人,而是由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即‘一起说话’来建立,也就是拉丁语所说的 colloquium”。他认为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前被殖民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着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而“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①。

在这样的语境中,许多中国学者也正在努力从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和当前的中国文化现实中,开发出有益于解决世界难题的新的思想,如个人与非个人(即关系),天下与帝国,情与理性,礼与法,“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宗教战争,中国经典诠释与西方诠释学,“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也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引起世界瞩目。

以上思想的开拓不同程度地构成了当今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参考。

二、什么是世界文学?

目前,众多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热烈讨论正是以上思想新视野的一种反应。两年来,上海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季刊组织了多期世界文学的讨论专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精彩意见。

在我看来,过去中国学者一般采用的世界文学概念多半是歌德和马克思的定义的延伸。前者强调世界文学是各民族优秀文学的聚合体,后者强调“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由过去的“许多”形成了“一种”,即一种不同原样的、总体性的新的世界文学。时代前进了,这两种定义看来都有某些缺陷。中国一些学者认为歌德和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可贵的乌托邦。这些学者认为世界文学并不如歌德所想,只是各种优秀作品的、互不相关的聚合,而是互识、互证、互补的、带有比较文学意味的、有机的结合;世界文学也不如马、恩所想,是融多种文学为一体的新的合金,而是保持着、发展着各自特点,从其他文学汲取着营养,也为其他文学不断作出独特贡献的各不相同的文学的共同体。

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探索,从开始就有一些不同的路向。其开端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首在省己,亦必知人”。“省己”,即了解自己,这显然是首要的。例如谈到拜伦、雪莱的恶魔诗派对俄国和东欧的影响时,他首先关注的是:“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因此“普式庚之所爱,渐去裴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指出这是“国民性之不同使然”。鲁迅指出拜伦、雪莱在东欧影响深远,“入俄则起普式庚和莱蒙托夫,至波兰则作诗人密克微支和斯洛伐支奇,入匈牙利则觉裴彖飞”。但鲁迅对这些影响的论述都不是简单的汇总,更不是简单地“合为一体”,而是主张在汇通中保持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同时又指出其在与另一种文学发生关系时如何从中受益。

沿着鲁迅的思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杨周翰提出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首先

① 阿尔曼多·尼希:《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第1—3页。

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也就是强调首先要了解自己,要有深入的文化底蕴,才能使自己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而中国文学的理论、方法、欣赏习惯也就沿着这种有特色的解读逐步进入世界。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对世界文学也有其独特的思考。早在1991年他就提出“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他提出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在这种研究视野里,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并强调“中国文学这一元素加入到国际比较文学的总体背景上去以后,原来西方人赋予的整个世界观都将应该有所变化”。他的这些主张与当前对世界文学的讨论有许多吻合之处。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不遗余力地在文学实践中寻找这样的“世界性因素”。他多次谈到的“忏悔意识”、“恶魔意识”、“生存意识”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不同文化所蕴含的普遍价值,这些价值通过自己的文化特色得到不同表现并沿着互识—互证—互补的比较文学途径,得到新的不同发展。2011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10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对“世界性因素”的提法有所质疑,我想,如果不作本质主义式的理解,在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网络性的前提下,“世界性因素”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个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讨论。

北京的一些青年学者在探讨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新的看法。他们特别强调了动态和开放的心态。如《文学的解放》一文强调,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必然是“世界的”。“文学”的“客观对应物”和“意向性客体”是世界。世界不仅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而且“世界的存在具有一种发生的性质”。换言之,世界“世界着”。“世界”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自身的绽露和延异。他们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成不变,主客二分的习惯思维定式,强调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另一篇文章《什么“世界”,如何“文学”》更明确地强调世界和文学都在不断变动之中。如巴赫金所说,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含义在另一种含义相遇交锋之后,才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此,“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实质上是探索一条在多元化语境下国际文学生态建构的路径,推动多元性文学价值理念和标准在世界文学生态中形成”。也就是说,世界文学就是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世界是自相差异的,文化更是自相差异的。识别这些差异,让这些差异在相互的碰撞中得到彰显,并互相吸收、受益而有新的发展,这是比较文学的本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现代概念,是相互确定和相互产生,互为对象的。两者存在于一种动态的建构关系之中。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别文学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进行相对封闭孤立的研究,而是不可避免地注入了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因素,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互为主观、互为参照、双向阐发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不可阻挡地突破了国别文学的自我设限,打开了国别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新途径;另一方面,比较文学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框架,而是着重研究不断变化的各国文学之间的理论、关系和动态,即侧重研究变动不居的“文学间性”、“文化间性”和异质空间等新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动态中的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对象,没有作为对象的

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前导,有助于世界文学的凝聚和变异,没有作为认识论(互动认知)和方法论(互识、互证、互补)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很难发展,甚至只能是无意义的材料堆积或散沙一盘。

从事实来看,比较文学确实为世界文学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以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特别是翻译,使得原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国别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也就是成为他国文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别文学的特殊形式。如北京大学张辉教授所指出,如果不是杨绛先生的翻译,对一个不通西班牙语的人来说,《堂吉珂德》永远是个陌生存在,甚至只是一个不存在;而多亏了鸠摩罗什、玄奘,多亏了季羡林、金克木……佛经和梵语文学事实上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圣经、莎士比亚的翻译等,亦复如是。而这些卓越翻译家和研究家,他们所做的正是比较文学的工作;换句话说,是外来文学通过比较文学的途径为原来的本土文学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其获得了新的世界性特色。另一方面,本土文学也通过比较文学的途径为新进入的外来文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因而给外来文学增添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因素,也就是增添了新的世界性质素。这就是某些学者强调过的,世界文学必然是从某种文化出发,对另一种文学进行新的特殊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这种全球化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新精神正在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这无疑会带来整个文学研究的重建和更新。

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转型和发展的伟大时代,我们不能不面临许多未曾解决和不断涌现的理论新问题。在我的思绪中,首先是文化相互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融合而消失呢?接受外来影响会不会改变其原有文化的根本特征?文化是否因其差异而“不可通约”以至于无法沟通呢?其次是对话中的“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他者”既是我所“不是”,就应该首先关注其相异性本身。只有充分显示这种“面对面”的相异性,“他者”才有可能成为反观“自我”的参照系。然而,只强调相异性,又往往会“各不相干”,难于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不强调相异性,又会牺牲对方的特色而使他者和自我趋同,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悖论呢?再次,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对话的话语(discourse)问题。平等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目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达成广泛认同的一整套概念体系。这套话语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思考,并在与不同文化的交往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抛弃这种话语,生活将难以继续;然而,只用这套话语及其所构成的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会因不能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摒除在外,果真如此,所谓对话就只能是同一文化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而已,并不能形成真正互动的对话。如何才能建构一套真正有利于平等对话,有所创造的新的话语呢?

除了这些我们曾长期讨论而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之外,还有许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如强势文化对新独立文化的随意“挪用”,也就是美国式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即以他们对各种文化的霸权式的解读作为全球多元文化的唯一解读。这实质上仍是一种精神殖民,

西方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平等看待甚至仇视他种文化。最近挪威发生的血案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原被殖民国家的人民如何终于从精神的殖民中得到彻底解放,也还是一个问题;其他还有如何勾画出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的问题;以及中国和世界正在经历的印刷文本文化的移位和媒体意象文化的兴起,及两者交织互构的动态关系问题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

总而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人们越来越感到在建构一个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理想世界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和作为其对象的世界文学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世界所有文学研究者将并肩前行,重新定义文学和人文主义,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为铸造新的精神世界而共建伟业。